

政策不确定性与诉讼效率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罗党论 王文睿

罗党论，男（1979-），博士，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教授。

王文睿，男，博士，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通讯作者：：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邮政编码：510275

联系电话：18666091866

电子信箱：luodl@mail.sysu.edu.cn

本文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0902024）、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GD14CYJ03）、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4A030313118)。

政策不确定性与诉讼效率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摘要：地方官员对辖区内的社会、经济环境有很大的影响力。有研究表明，由地方官员变更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已经影响到企业投融资，甚至影响到经济增长。本文研究这样的问题：政策不确定性对当地的法律环境影响如何？具体而言：（1）由官员变更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是否会影响到企业的诉讼效率？（2）又有哪些因素会加剧或减弱这种作用机制？本文以 1995-2013 年沪深上市的企业为研究样本加以考察。研究发现，政策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的诉讼效率，而且对民营企业的影响尤甚。进一步，政策不确定性越大，对诉讼效率的影响越大。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行政权力对于司法权力影响的了解，同时有助于明晰政策不确定性的具体传导机制及其引起的经济后果。

关键词：官员变更；政治不确定性；诉讼周期

一、引言

近年来，中央提出了推行干部任期制的要求，各地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但地方领导干部调动过于频繁、任职难以届满的现象仍普遍存在。《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明确规定了党政领导职务每个任期为五年。但是根据整理后的数据统计，2001-2014 年地级市市长平均任期仅为 3.20 年。其中，大部分市长任期为 2 年（26.90%）或 3 年（25.95%），任满五年或以上者仅占 19.78%。此外，每年有接近或超过 20% 的城市或省份发生党政领导干部变更，部分年份甚至超过 40%。由于官员变更往往破坏了当地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从而会对企业资源配置产生影响。

曹春方（2013）以官员更替代表政治权力的转移，研究了法定政治权力和事实政治权力对公司投资的影响，徐业坤等人（2013）和陈艳艳、罗党论（2013）均研究了这种官员更替对投资的影响。罗党论、余国满（2015）发现书记或市长更替引起的政策不确定性会提高城投债的发债风险。本文研究这样的问题：政策不确定性对当地的法律环境影响如何？具体而言：（1）由官员变更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是否会影响到企业的诉讼效率？（2）又有哪些因素会加剧或减弱这种作用机制？

受儒家文化熏染，中国人讲究“以和为贵”、“息讼止争”传统的解决纠纷或者冲突的方法主要是调解、谈判和协商等非对抗性方式，诉讼一直是被避讳的。甚至还有“想活别打官司，想死别进地狱”、“饿死不做贼，屈死不告官”之说，涉及诉讼成了“惹官司”，厌诉文化可见一斑。正因为诉讼是一种高成本解决利益冲突的方式，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次优的解决方案（王彦超等，2008），一般是在双方关系僵持到破裂甚至公开分裂状态才使用。但一旦涉诉，各方的利益诉求又会不一样，有的期望越快结束越好，能有一个结果了解，有的希望旷日持久。

然而，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是：目前国内发生的各种诉讼越来越多¹，但案件积压、拖延的情况也不断出现²，诉讼成本不断提高。而另一方面，不少企业间的经济纠纷案虽然涉案金额巨大，案件类型与上

¹据《2011 年中国法律发展报告》统计，1978 年到 2010 年间，合同案件由 3232 件增长到 322.2 万件，所占比例由 1% 增长到 53%，权属侵权案件从 4.4 万件增长到 144.5 万件，所占比例由 15% 增长到 24%。

²虽然我国民法 135 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法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同时民法 135 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

述提到的被拖延案件类似，但却能在短时间内得到高效解决³。

勾自强（2008）提出在当前中国的法律诉讼程序中，证据开示制度缺失、审前过滤机制的不完善、证人出庭制度因素以及法官、执法人员的素质因素都影响着最终法律诉讼的效率。当然，这些因素如纠纷案件类型多样，利益关系多元，涉及股东权益、公司利益、公司治理、公司债权人利益等多个方面问题，而且审理过程中新情况不断涌现，也是造成上市公司不少案件拖延多年的原因。我们会发现：目前学者对影响企业法律诉讼效率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司法机关、法律制度以及企业内部因素方面，而忽视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乡土社会中，行政权力会对司法权力会产生很大的干涉。

中国的各级司法机构往往听命与同级政府，同级政府主政官员的一句话可能会对法官的判决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为地方官员干预司法提供了可能。但是正是这种情况的存在，随着官员的变更，以及其他的政治的不确定事件的发生，都可能对司法过程中诉讼周期产生影响。

我们使用 1995 年—2013 年全国各省市诉讼案件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地方官员变更引发的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诉讼效率间的影响。文章发现政策不确定性的确影响到降低了企业的诉讼效率，而且对民营企业的影响尤甚。进一步，政策不确定性越大，诉讼效率影响越大。

本文的可能的贡献在于：

第一，当前对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系统风险对公司经营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政治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决策和融资决策的影响，而忽略了政治不确定性对法律环境的影响，本文通过研究政治不确定性与诉讼效率的问题弥补了这一研究空白；

第二，由于地方官员根植于当地，对当地政治环境有很大的影响，进而影响当地的法律诉讼环境，我们采取地方官员变更来刻画政治不确定性，相比以往国外文献中采用的总统选举变量（Goode11 and Vähämaa, 2013）或国内文献采用的省长、省委书记变量（王贤彬、徐现祥，2008），我们的研究精细到地级市官员的变更，能够获得更严谨的实证结果，同时我们为结果的稳健性，还将官员变更细分为市委书记变更、市长变更、任一变更、双变更这四种类型；

第三、当前研究公司诉讼风险的相关研究基本上选用的是公司发生诉讼的概率（宋乐、张然，2011）或诉讼案件（Lu et al., 2014）取胜情况作为诉讼风险的替代变量。此种处理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发生诉讼带来的风险，但是很难衡量一次诉讼的过程给公司带来的风险，但是在实际的诉讼案件中，一个案件可能给企业带来不可预计的风险，本文创新性的采取了案件诉讼周期作为变量，考察了地方官员变更对于企业诉讼周期的影响，从案件诉讼纵向考察了官员变更对于司法的影响。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提出了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本文的样本选择和变量描述；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与分析；第五部分是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是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二、 研究假设

企业风险及其影响因素一直都是公司经营领域的重要话题。企业风险按来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内部治理机制引起的非系统性风险，一类是受外部宏观环境影响的系统性风险（张志强，2010）。

从内部角度看，余明桂等（2013）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给企业带来更高的风险水平，李文贵等（2012）研究发现企业所有权性质会影响企业经营风险，张敏（2009）的研究表明多元化程度都会减弱企业风险；从外部角度看，所有企业都将受到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环境等宏观因素的影响。对于企业外部风险的研究目前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宏观经济政策变动造成的风险，二是政治环境的风险。

国外文献对于政治环境对企业经营风险的研究主要考察政治环境变动对于企业投资的影响，如

³比如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南市支行与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公司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累计涉案金额达到 1.125 亿，但前后诉讼时间不足一周

Bemanke(1983)、Bloom et al. (2007)阐明了企业在面临政治不确定性时会变得谨慎,减少或者延缓投资直到不确定性得以消除, Mauro(1995)则证明政治不确定和腐败均负向影响投资支出水平; Yonne (2010)的实证研究发现, 1964~2008年总统大选期间, 美国企业的投资支出减少了大约2%; Cohen等(2011)对美国参议员变更的研究也表明, 各州当选参议员会导致当地政府支出的增加进而导致私营企业投资支出急剧减少; Julio和Yook(2012)以48个国家1980~2005年的公司样本数据发现由于选举期间政治不确定性会导致经济政策不确定, 公司在政治选举年份会显著缩减投资。

而国内近年对于政治不确定性的研究也日益增多, 但也主要集中在政治不确定性对于整体经济增长和企业投资方面。王贤彬、徐现祥(2008)从官员的来源、离任去向和任期这三个角度, 探索这些因素对当地经济增长的影响。曹春方(2013)以省委书记更替为研究对象验证了政治影响企业投资的中国逻辑, 即省委书记更替产生的事实政治权力转移所致的政府干预减少是导致国有企业投资支出下降的主要原因。

由上可知, 当前国内外对于政治不确定性对企业经营风险的研究仍然集中在对于企业投资的影响上, 但对于政治不确定性对企业的法律风险的研究相对较少。

近些年来, 随着国际上“法与金融”学派逐渐兴起, 法学界和经济学界开始关注法与经济的研究。国外学界, 以La Porta et al.(1997, 1998, 1999, 2000a, 2000b, 2002)为代表的一系列研究强调了法律对公司治理、投资者保护以及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性。国内学者姚莉(2006)从司法的时间效率、资源成本效率和边际效率等不同的角度加以透视探讨了提高司法效率的途径; 陈卫东、王政君(2000)从诉讼周期、司法工作人员数量与素质、诉讼程序、自诉案件与公诉案件的适用范围、司法机关独立程度等几个方面研究了诉讼中的司法资源配置问题; 与此同时经济学领域关于诉讼影响因素的经验研究主要有外部制度层面和公司层面两个方面。制度层面的研究表明法律、制度的完备性(Haley, 1978)、制度的质量及执行力(Ramseyer, 1988; Ramseyer and Nakaza-to, 1989)和市场(法律)的发达程度(王彦超等, 2008)等都是影响诉讼的重要因素; 公司层面的研究表明低效率的谈判(Bhagat et al., 1994)、信息披露策略的选择(Francis et al., 1994; Skinner, 1994, 1997)、盈余管理(Gong et al., 2008)、高管股票期权激励(Denis et al., 2006; Peng and Reell, 2008)、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治理作用(Amoah and Tang, 2010)、过度投资(Mc Tier and Wald, 2011)等因素与公司诉讼相关。但是这些研究都未涉及到政治不确定性对于企业诉讼风险的影响。

在中国的司法和行政系统下, 中国的法院在运行中类似于政治系统中的一个行政单位, 其权威来自于国家而非法律, 司法体系的运行往往受当地行政体系的制约。一次地方主政官员的变更往往会给当地的政坛带来一次“地震”。因为原有的关系体系随着旧任主政官员的离职被打破, 而新任主政官员的到来意味着新的关系体系需要建立。在这一过程中, 当地法院的精力会被分散, 而且原有的审判路径和判决方案可能会由于新的行政体系的建立而发生改变。因此, 法律环境的不确定性往往会受当地政治不确定性的影响, 进而给企业的诉讼造成影响, 延长企业诉讼周期。Clarke et al.(2006)认为, 中国的法律系统总体上是政府实现对社会控制的一个工具, 法律制度仍然是政府而不是公民或诉讼人导向的。这使得企业在面临诉讼的时候面临的不仅仅是法院一个权力主体, 还有其背后的政府。宋乐、张然(2011)以法律诉讼作为高管风险控制能力的代理变量研究发现高管政治关联及高管的变更与企业法律诉讼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基于此, 我们提出第一个假设

H1: 地方官员变更产生的政治不确定性将延长上市公司诉讼案件的诉讼周期。

中国是“熟人社会”, 地方官员在长期的任职中, 由于熟人网络的建立, 或者长期任职下对于地方党政司法存在正式权力之外的影响力——“隐权力”。与正式权力不同, “隐权力”则来自私人关系网络的权力辐射, 它的权力取决于个人在关系网络中的亲疏顺序, 与本人的官阶没有直接关系, 同样的官位在不同的人手里, 所产生的“隐权力”可能是不一样的; 同一个人, 职位不变, 但置身于不同的关系网络,

所获得的“隐权力”也可能是不一样的。对于地方官员而言，地方官员的变更带动了“隐权力”的变动。导致官员变更前后，行政体系变更对当地的不确定性影响产生差异。徐业坤（2013）、曹春方（2013）在研究时发现，若新上任的市委书记或省委书记不具本省工作经历时，意味着与当地企业的关系可能更加疏远，政治不确定性程度加深，导致企业投资支出水平下降的更多，从而加剧企业所面临的风险。我们认为当新任官员与地方联系更为密切时，其造成的政治不确定性程度便会越小，从而企业面临的诉讼周期延长风险也相对较小。基于此，我们提出第二个假设

H2: 新任官员与当地的联系越密切，官员变更导致的政治不确定性程度将越低，从而对诉讼时长的延长作用较弱。

目前在中国，政府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因此，一方面，相比民企，国企天然与政府建立了亲密关系，并可利用这种关系网络减少公司诉讼案件的诉讼周期，降低由于诉讼风险带来的损失。另一方面，由于国企一般规模较大、承担着较多政策性任务，是地方 GDP 增长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因此在我国目前官员升迁主要以经济绩效为考核指标的现实背景下，地方官员与当地国企之间将呈现一种互相依赖、互利共赢的关系，从而较民企，政治不确定性对国企造成的诉讼周期延长的影响可能将更小。而对于民企，尤其是有政治关联的民企，在地方政府拥有广泛自由裁量权的环境下，培育政治关联至关重要（Li et al., 2009）。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可以帮助民营企业获得融资好处（胡旭阳，2006；余明桂、潘洪波，2008），缓解融资约束进而缓解投资不足，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Chen et al., 2009）。由于法律诉讼案件既会耗费公司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又会造成公司的名誉损失。因此民营企业往往会利用自身的政治关系来加快诉讼案件进程，尽早结束案件。而地方官员变更带来的当地政治环境的变化，会使民营企业原有的政治关系被打破，无法继续利用原有政治关系来降低公司诉讼案件周期。基于此，我们提出第三个假设：

H3: 对于实际控制人为国资的企业，这种政治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相对较小；对于实际控制人为非国资企业，这种政治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相对较大。

三、 样本选择与变量描述

（一）样本选择

本文的法律诉讼数据来源于 wind 资讯:从 1995 年-2013 年，wind 数据库中有记载的一审法律诉讼案件共计 8657 条,在 wind 数据库的已有数据中，部分案件的起诉日期和判决日期有空缺。通过查找上市公司年报和法院判决书以及网络途径，我们将部分案件的起诉日期和判决日期进行完善，获得了 2141 条起诉日期和判决日期都具有的数据。删去国家级诉讼案件、区县级诉讼案件、港澳、仲裁及海外诉讼案件、没有明确诉讼金额案件以及案件诉讼当年财务报表不完整的案件，共获得样本数量 1808 个。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我们对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 1%的 Winsorize 处理。

官员变更数据来源于我们人工搜集的数据库。我们通过地方年鉴、网络搜索（www.baidu.com）等各种途径，完成了全国 335 个地级市和 31 个省份连续 19 年（1995-2013）的地方官员数据的收集工作。公司层面的经济变量来自 wind 资讯。

（二）变量描述

（1）被解释变量的选取

诉讼周期（time）

我们参考了陈卫东、王政君（2000）、姚莉（2006）、王福华、融天明（2007）对法律诉讼的研究，

选取诉讼周期(Time)作为上市企业法律诉讼受到官员变动影响程度的衡量指标。我们采用各涉案公司的第一手资料，以公告中公司诉讼案件的起诉日期和判决日期作为诉讼周期的起始点。比如外高桥诉上海中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托投资纠纷一案，外高桥于2003年6月13日起诉上海中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3月12日做出一审判决，随后外高桥在2005年7月22日披露了这一案件。对于此案件，诉讼周期即为从2003年6月13日到2004年3月12日跨越的时间段，即273天。



(2) 解释变量的选取

a. 地方官员变更(change)

官员变更会导致政治不确定性 (Alesina and Perotti, 1996)，我国目前地市层面的官员变更已是一种常态 (陈艳艳、罗党论, 2012)。故我们用地方官员变更来衡量政治不确定性。本研究定义 change (虚拟变量) 来表示地方官员变更。由于我国法律规定，一审审限不得超过 6 个月，遇到特殊情况需要延长，可向本院院长申请延长 6 个月，还需延长需向上级法院申请。由于申请延长在我国是普遍存在的情况，且大量案件有申请 6 个月的期限延长，而且对于案件诉讼周期延长的申请是发生在诉讼开始后的半年内，而进一步得申请则是对于诉讼周期少于半年的案件，如果在诉讼周期发生官员变更记为 1，否则记为 0。发生在诉讼开始后的一年内。对于诉讼周期长于半年少于一年的案件，若在起诉日期的半年内发生官员变更我们记为 1，否则记为 0。对于诉讼周期长于一年的案件，若在起诉日期的一年内发生官员变更我们记为 1，否则记为 0。官员变更分为市（省）长变更、市（省）委书记变更、任一变更和双变更。

b. 变更程度

我们用官员是否异地变更来度量官员变更的程度。参考徐现祥、王贤彬、舒元(2007)，张军等(2007)对官员变动类型的判别，定义为 external：异地调任为 1，非异地调任为 0。若新任官员是从异地调任，即在新上任省市的工作经历未届满一届，则定义为异地调任，External 取值为 1，其余情况视为本地升迁，取值为 0。

c. 企业的实际控制人(state)

我们用虚拟变量 state 来衡量国有及民营区别：是否是国资委或地方国资委，若是则为 1，若不是则为 0。

(3) 控制变量的选取

根据以往文献对上市公司法律问题的研究 (许年行, 2013)，我们在选取控制变量时考虑了企业绩效和公司治理情况两方面因素。首先，企业绩效方面，我们控制了公司规模 (size)、资产负债率 (leverage)、净资产收益率 (ROE)，一般认为，企业规模越大、负债比率越低、盈利能力越强，则企业越有可能对它的诉讼案件产生影响。其次，公司治理情况方面，我们控制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ownership)，一般认为企业持股比例越集中，股东越有可能对公司的诉讼案件产生影响。

其次，案件本身的个体特征也有可能对案件的诉讼周期产生影响，对于涉案金额 (amount) 较大的案件，原被告 (plaintiff) 的争取力度更大，法官判决更谨慎。而样本公司在案件中原被告身份的不同，

也会影响案件的周期。

诉讼法院所在地的法律环境指数也有可能对案件的诉讼时长产生影响，法律环境指数越高意味着当地法律环境越公正。但同时法律环境指数越高的城市一般经济越发达，审理的案件越复杂，审判难度越大。

此外，我们还控制了年度变量 (Y_y)、行业变量 (Y_{ind}) 和案件种类变量 (Y_{type})。其中，年份变量我们按案件起诉日期发生年份进行分类控制，行业变量我们根据证监会的行业分类进行分类控制，案件种类变量我们参考 Lu et al. (2014) 将案件种类分为银行与企业间的借贷；日常业务合同纠纷，其它诉讼三类，进行分类控制。

具体的各种变量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解释表

	变量名称	简写	定义
被解释变量	诉讼周期	Time	从案件起诉日期到判决日期的时间跨度
解释变量	书记变更	S-change	城市当年书记发生变更为 1，否则为 0
	市长变更	M-change	城市当年市（省）长发生变更为 1，否则为 0
	任一变更	A-change	城市当年书记和市（省）长有任意一位发生变更为 1，否则有 0
	双变更	B-change	城市当年书记和市（省）长同时发生变更为，否则为 0
	书记异地调任	S-external	书记从异地调入为 1，否则为 0
	市长异地调任	M-external	市（省）长从异地调入为 1，否则为 0
	企业的实际控制人	State	企业实际控制人为国资委或地方国资委为 1，否则为 0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起诉当年末，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净资产收益率	ROE	企业起诉当年末净利润/平均股东权益
	资产负债率	Leverage	企业起诉当年末的总负债/总资产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Ownership	第一大股东起诉当年末的持股比例
	涉案金额	Amount	诉讼案件涉及金额对数值
	是否为原告	Plaintiff	披露方若为原告则为 1，若为被告则为 0
	法律环境指数	Lawindex	诉讼法院所在地在诉讼开始当年的法律环境指数。其中法律环境指数为樊纲等（2003, 2007, 2009, 2011）编制的历年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数。 ⁴
	年度哑变量	Y_y	控制年份影响
	行业哑变量	Y_{ind}	控制行业影响
	分类哑变量	Y_{type}	控制案件影响

（三）模型设定

H1:

$$Time = \beta_0 + \beta_1 Change + \beta_2 Size + \beta_3 ROE + \beta_4 Leverage + \beta_5 Amount + \beta_6 Ownership + \beta_7 Plaintiff + \beta_8 Lawindex + Y_{ind} + Y_y + Y_{cata} + \varepsilon$$

⁴因为该指数更新到 2009 年，故 2000-2009 年法律环境指数分别来自樊纲等编制的历年指数值。对于 2010-2013 年的指数，借鉴余明桂等（2010）的方法 Lawindex 的取值我们用 2009 年的数值来替代。

H2:

$$\text{Time} = \beta_0 + \beta_1 \text{Yidi} + \beta_2 \text{Size} + \beta_3 \text{ROE} + \beta_4 \text{Leverag} + \beta_5 \text{Amount} + \beta_6 \text{Ownership} + \beta_7 \text{Plaintiff} + \beta_8 \text{Lawindex} + Y_{ind} + Y_y + Y_{cata} + \varepsilon$$

H3:

$$\text{Time} = \beta_0 + \beta_1 \text{Change} + \beta_2 \text{Size} + \beta_3 \text{ROE} + \beta_4 \text{Leverag} + \beta_5 \text{Amount} + \beta_6 \text{Ownership} + \beta_7 \text{Plaintiff} + \beta_8 \text{Lawindex} + Y_{ind} + Y_y + Y_{cata} + \varepsilon$$

(分组检验)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我们统计了 1995 年到 2013 年全国 22 个省份（除台湾）以及 4 个直辖市、5 个自治区的上市企业法律诉讼基本情况，包括诉讼年份、案件类型、涉案金额、法院所处地区、诉讼周期、原被告信息等。我们通过上市公司所诉讼至的法院级别将其匹配到对应行政级别，主要是省级和市级，并对各年份案件进行发生频数、诉讼周期、以及地方官员变更频数的统计。

表 2 各年度各省上市公司诉讼案件与官员变更统计

年份	案件频数	诉讼周期			书记变更	市长变更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1995	1	2186	2186	2186	0	0
1996	10	1499	184	815	3	3
1997	8	1229	67	378	3	4
1998	20	1232	26	264	7	3
1999	63	2222	9	291	8	12
2000	86	1709	4	265	14	20
2001	69	2076	2	259	17	36
2002	65	1313	22	313	26	21
2003	99	2116	4	352	16	52
2004	136	2010	2	332	22	20
2005	193	1964	5	399	81	72
2006	152	1818	3	343	41	36
2007	119	1784	7	323	54	37
2008	153	1329	5	303	33	37
2009	205	1646	3	323	43	40
2010	136	1266	3	270	32	38
2011	119	722	3	243	27	47
2012	110	801	5	208	31	40
2013	64	316	9	122	12	22
总计	1808	2222	2	307	470	540

从样本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出在 1808 个样本中，共有 470 个样本在诉讼时期内经历了诉讼法院所在地的书记发生变更，共有 540 个样本在诉讼时期经历了诉讼法院所在地的省长或市长发生了变更。而且，从 2005 年开始案件平均诉讼周期呈现一个逐年递减的趋势，这反映了我国法制化建设进程良好，地方法院的诉讼效率逐年提高。但是，除了 2013 年，其余年份的案件平均诉讼周期均高于 180 天，这说明仍有许多案

件在审判时申请了诉讼周期延长，这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的法制化进程仍需完善。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 3 所示：

表 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察值个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中位数
诉讼周期	1808	306.59	351.60	2	2222	184
书记变更	1808	0.26	0.44	0	1	0
书记是否异地	470	0.54	0.50	0	1	1
市长变更	1808	0.30	0.46	0	1	0
市长是否异地	540	0.37	0.48	0	1	0
双变更	1808	0.14	0.35	0	1	0
任一变更	1808	0.42	0.49	0	1	0
是否国企控股	1808	0.51	0.50	0	1	1
企业规模（经对数处理）	1808	11.82	1.38	2.14	22.08	11.66
净资产收益率	1808	-0.22	2.02	-54.81	20.14	0.12
资产负债率	1808	1.23	4.89	0.02	138.38	0.69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	1808	0.33	0.15	0.04	0.95	0.29
法律环境指数	1808	9.25	5.04	0.18	19.89	7.62
披露方是否原告	1808	0.33	0.47	0	1	0
涉案金额（万）	1808	6226.62	87540.93	0	2864855	1300

从上表看，诉讼周期最小为两天，最大为 2222 天，不同案件的诉讼周期差距很大。诉讼案件的中位数为 184 天，说明近半数案件都在法律规定的六个月内完成一审审判，而有半数的案件申请了 6 个月的延长审判。更有部分案件在 6 个月延长审判的基础上继续延长。

为了初步直观上说明诉讼周期与官员变更的相关关系，这里选取样本中平均诉讼周期排名前十的城市以及这些城市在 1995-2013 年之间发生书记变更和市长变更的总次数。从下表的统计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平均诉讼周期较长的城市在这 19 年间发生的官员变更次数普遍较多，这初步地验证了我们的假设。

表 4 平均诉讼周期排名前十的城市及其官员变更情况统计

城市	平均诉讼周期	书记变更次数	市长变更次数
郑州市	518	5	5
广州市	500	5	4
佛山市	483	6	5
长沙市	416	5	3
武汉市	397	5	5
青岛市	382	4	4
杭州市	376	3	6
兰州市	370	6	4
北京市海淀区	368	4	5
深圳市	313	5	6
平均值	412.3	4.7	4.3

（二）官员变更与诉讼周期相关的直观证据

从各省市上市公司案件诉讼周期与官员变更各具体情况的关系中，可以找到符合本文假设的规律，这里的具体情况可以分为：1、地方官员是否变更；2、新任官员是否是异地变更；3、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是否为国企。如下图示反映了这三种情况下诉讼周期与官员变更关系的规律。

（1）官员变更与诉讼周期的关系

为了直观体现官员变更与诉讼周期的关系，我们将比较各年份发生官员变更的案件平均诉讼周期与没有发生官员变更的案件平均诉讼周期。但是由于 1995-1998 年样本数量较少，计算平均值时会产生较大的误差。所以在作图时我们忽略这四年的样本。

图 1 书记变更与平均诉讼周期统计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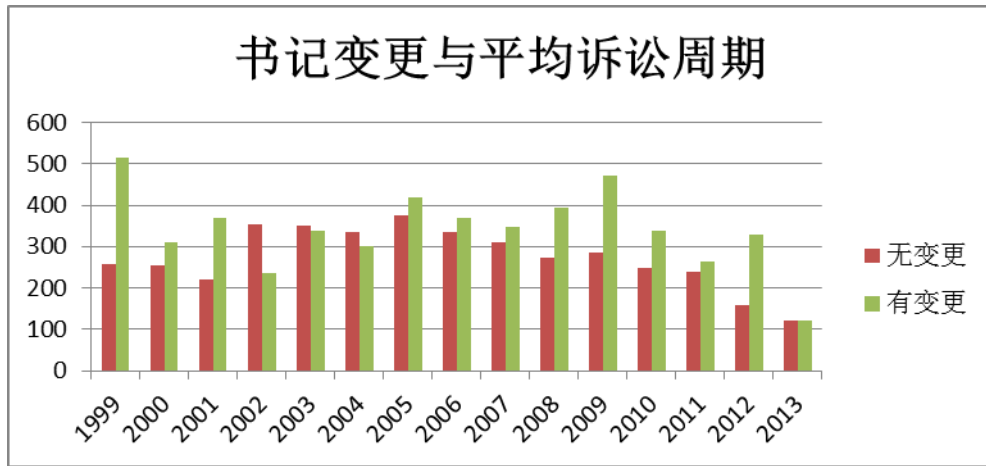


图 2 市长变更与平均诉讼周期统计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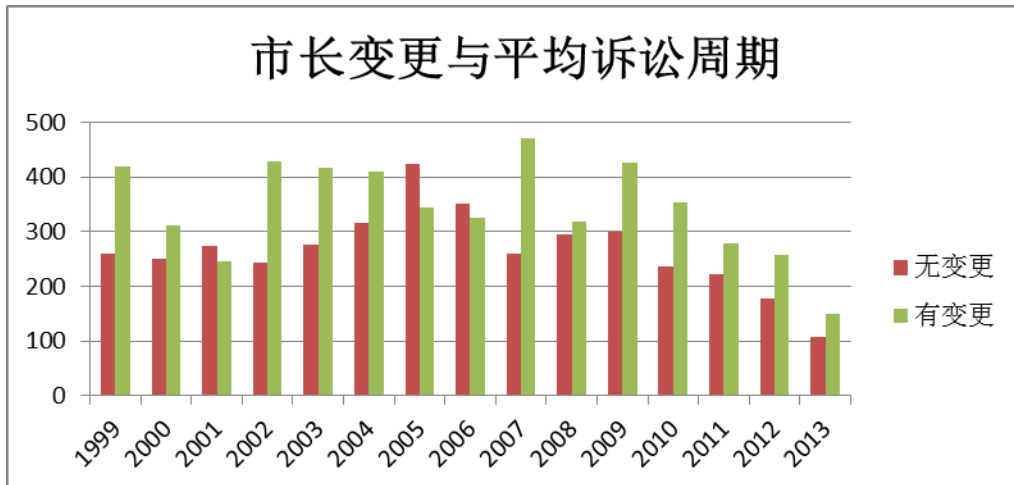


图 3 任一变更与平均诉讼周期统计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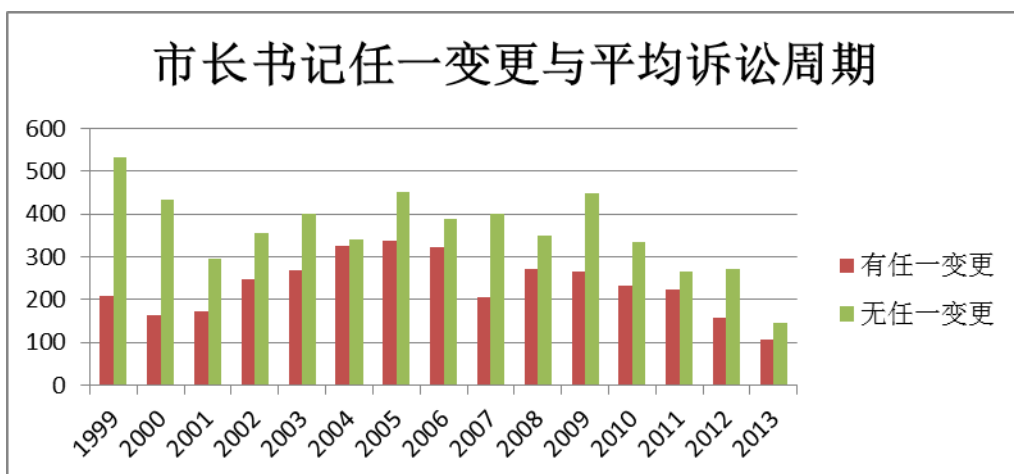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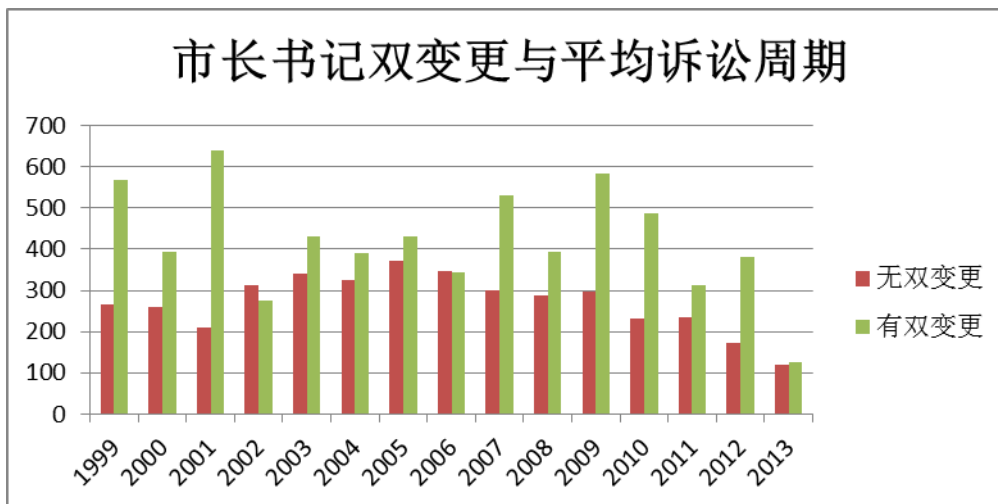


图 4 双变更与平均诉讼周期统计图



从以上四个图我们可以很直接地看出，在大多数年份中，无论发生何种类型的官员变更，发生官员变更的平均诉讼周期明显高于没有发生官员变更的平均诉讼时长。在1999年到2001年和2007年到2012年这两段时间内，官员变更带来的诉讼周期的延长作用最为明显。而且当当地的书记和市（省）长同时发生变更时，平均诉讼周期收到官员变更的影响大于只有一种变更发生时带来的诉讼周期延长的影响。这和我们的假设一基本一致。

(2) 政治不确定性程度与诉讼周期的关系

图5 书记是否异地调任与平均诉讼周期统计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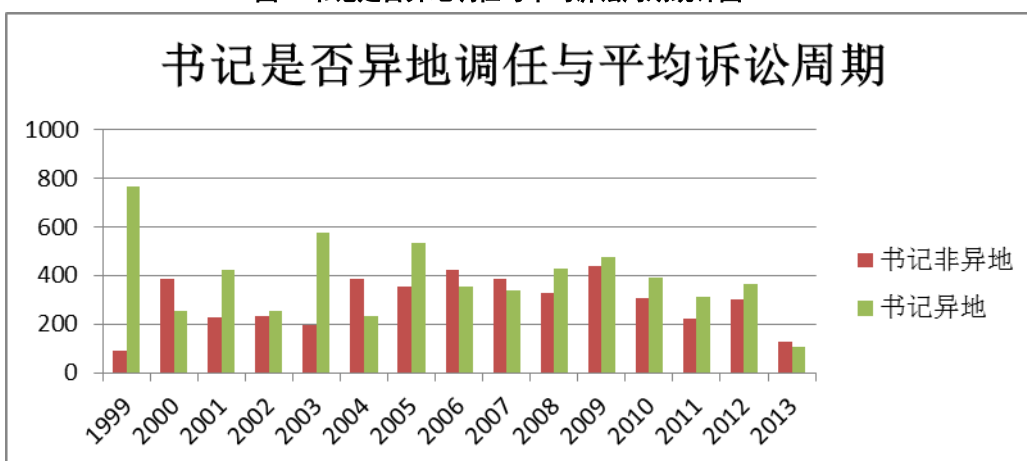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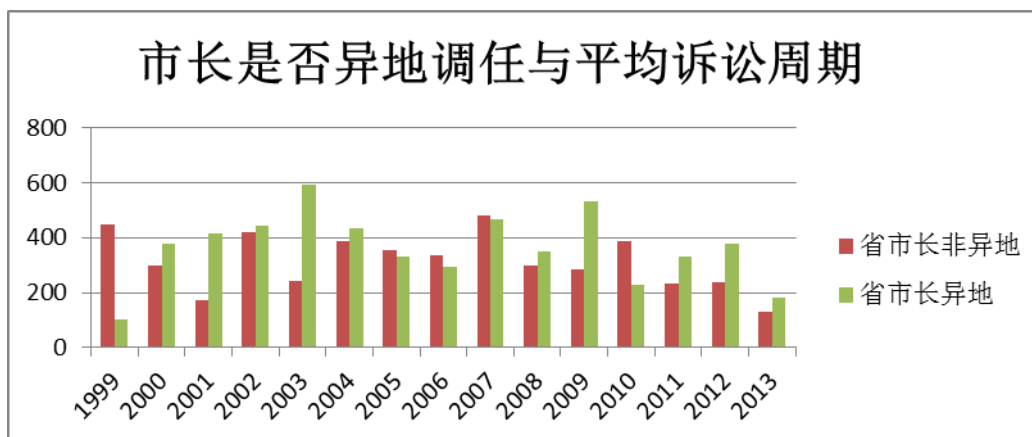


图6 市长是否异地调任与平均诉讼周期统计图



从上面的两个图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在大多数年份，官员发生异地调任的诉讼周期明显高于官员为本地迁升的诉讼周期。在2001年到2003年和2011年到2013年这两段时间内，市长异地调任和书记异

地调任均对诉讼周期起到了显著的延长作用。这与我们的假设二基本一致。

(三) 分组检验

表 4 分组检验结果

变量	样本组	观测值	均值检验		中位数检验	
			均值	T 值	中位数	Z 值
书记 变更	书记发生变更 (S-change=1)	470	364.95	-4.2024***	257	-7.663***
	书记未发生变更 (S-change=0)	1338	286.09		163	
市长 变更	市长发生变更 (M-change=1)	540	344.34	-2.9862***	231.5	-5.700***
	市长未发生变更 (M-change=0)	1268	290.51		163	
任一 变更	市长或书记任一变更 (A-change=1)	762	354.16	-4.9425***	236	-8.098***
	市长或书记均未变更 (A-change=0)	1046	271.93		150	
双变 更	市长或书记均发生变更 (B-change=1)	254	420.28	-5.6056***	288	-7.779***
	市长或书记没有同时发生变更 (B-change=0)	1554	288.00		169	
书记 异地	书记异地调任 (S-external=1)	253	410.14	-3.1659***	307	-3.960***
	书记由本地升迁 (S-external=0)	217	312.25		219	
市长 异地	市长异地调任 (M-external=1)	201	411.40	-3.5075***	260	-3.241***
	市长由本地升迁 (M-external=0)	339	304.58		217	

注：均值指 Beta 值，均值检验采用 t 检验，中位数检验采用 wilcoxon 秩和检验。*, **, *** 分别表示统计量在 10%, 5%, 1% 的水平上显著。

通过均值检验和中值检验，我们可以很直接地看出有官员变更时候的诉讼周期显著高于没有发生官员变更时候的诉讼周期。而且官员发生变更案件的诉讼周期均值和中值与没有发生官员变更案件的诉讼周期均值和中值相比有一个较大的差异，这说明官员变更对于诉讼周期有一个比较大的延时的影响。之后，我们对官员变更进行分组分为异地调任和本地迁升，均值检验和中值检验的结果均证明发生官员变更为异地调任时的诉讼周期显著高于发生官员变更为本地迁升时的诉讼周期。而且异地调任案件的诉讼周期均值和中值与本地升迁案件的诉讼周期均值和中值相比有一个较大的差异，这说明官员异地调任对于诉讼周期有一个比较大的延时的影响。这进一步验证了我们的假设。

(四) 实证检验

表 5 不同的官员变更类型与上市公司法律诉讼周期的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一) 官员变更			
	(1) 书记变更	(2) 市长变更	(3) 任一变更	(4) 双变更
Change	68.60494*** (3.82)	43.46763** (2.50)	74.37281*** (4.64)	111.1039*** (4.86)
Size	9.746827 (1.29)	10.30319 (1.36)	9.78118 (1.30)	9.756037 (1.30)
ROE	-14.51928 (-1.20)	-15.94081 (-1.32)	-14.27523 (-1.18)	-15.59524 (-1.29)
Leverage	-16.77236** (-2.18)	-15.55404** (-2.01)	-15.32237** (-1.99)	-16.78792** (-2.18)
Amount	8.324873** (2.03)	8.352795** (2.03)	8.539304** (2.09)	7.535973* (1.84)
Ownership	163.4819*** (2.94)	159.7323*** (2.87)	159.3979*** (2.87)	161.194*** (2.91)
Plaintiff	-4.606185	-3.400966	-4.111191	-3.181722

Lawindex	(-0.26) 6.492332***	(-0.19) 6.756045***	(-0.23) 6.820466***	(-0.18) 6.680149***
_cons	(3.60) 938.0688**	(3.74) 928.2297**	(3.79) 943.0577**	(3.72) 943.2542***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案件类型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808	1808	1808	1808
R ²	0.1386	0.1345	0.1420	0.1430
F 值	6.16	5.95	6.33	6.39

在回归（一）中，解释变量为官员变更，被解释变量为诉讼周期。从回归结果来看，在控制了行业、年度和案件类型之后，我们发现四种官员变更类型对诉讼周期的影响都是显著为正的。其中，当书记和省市长均发生变更时，对当地诉讼周期的影响比只发生单一变更大，造成当地平均诉讼周期增加 111 天。这是因为如果书记和省市长同时发生变更会对当地的政治环境产生很大的变化，原有的政治关系体系发生变化，法院需要付出大量的精力去适应这样的政治变化，进而影响了法院的审判效率。书记变更对当地诉讼周期的影响比省市长变更的影响更大，造成当地平均诉讼周期增加 69 天。这是因为，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下，书记是当地权利的核心，书记的变更比市长的变更会给当地带来更大的政治变化，因此对当地法律体系效率带来更大的影响。

控制变量中，诉讼案件的涉案金额、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当地的法律环境指数对诉讼周期的影响为显著正相关，资产负债率对诉讼周期的影响为显著负相关。企案件的涉案金额越多，案件情形越复杂，法院判决越谨慎，诉讼周期越长。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诉讼案件的不利判决对第一大股东的负面影响越大，第一大股东有更大的动机去影响判决结果。当地法律指数越高，当地经济普遍越发达，参与诉讼公司普遍为大公司且涉案金额多，所以诉讼周期越长。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越高，说明企业的财务状况不容乐观，所遭遇的诉讼案件审判更为棘手，诉讼周期便更长。

表 6 政治不确定性程度与上市公司法律诉讼周期的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二) 政治不确定性	
	书记异地调任	市长异地调任
yidi	91.08646*** (2.63)	89.0019*** (2.89)
Size	-8.065554 (-0.53)	-4.491049 (-0.33)
ROE	-42.68519* (-1.92)	10.86465 (0.47)
Leverage	-29.07456* (-1.67)	-8.158831 (-0.41)
Amount	12.01922 (1.38)	15.69586** (2.15)
Ownership	211.3456* (1.82)	-52.54268 (-0.52)
Plaintiff	31.01653 (0.86)	10.16352 (0.32)
Lawindex	11.87351*** (3.10)	9.14704*** (2.67)

_cons	690.3271* (1.72)	-161.0734 (-0.40)
行业	控制	控制
年度	控制	控制
案件类型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470	540
R ²	0.1743	0.2239
F 值	2.09	3.33

在回归（二）中，解释变量为异地调任，被解释变量为诉讼周期。从回归结果上看，在控制行业、年度和案件类型后，官员的异地调任与诉讼周期在 1%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说明异地调任的官员变更会比本地迁升的官员变更对当地的法律诉讼效率产生更大的影响。书记的异地调任与书记的本地迁升相比会使当地平均法律诉讼周期增加 91 天。省市长的异地调任与省市长的本地迁升相比会使当地平均法律诉讼周期增加 89 天。这是因为官员是本地迁升的，它在当地有一定的政治基础，原有的政治关系会得到保留，对当地政治环境的改变影响不大，进而当地法院不需要使用太多精力去应对这种改变，所以对当地法院的诉讼效率影响不大。而官员是异地调任的话，当地原有的政治关系被打乱，造成当地政治环境的较大变化，当地法院需要使用大量精力去应对这种改变，所以对当地法院的诉讼效率影响比较大。

表 7 不同产权性质官员变更与上市公司法律诉讼周期的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三) 产权性质			
	书记变更		市长变更	
	国有企业	私人企业	国有企业	私人企业
Change	42.94297 (1.63)	97.71818*** (4.06)	15.87508 (0.62)	92.48652*** (3.95)
Size	4.659854 (0.44)	32.24254*** (2.73)	4.983611 (0.47)	32.81276*** (2.78)
ROE	-8.783064 (-0.39)	-10.90331 (-0.78)	-8.961141 (-0.39)	-13.96451 (-1.00)
Leverage	-20.06554 (-1.51)	-0.4389281 (-0.04)	-19.84439 (-1.49)	1.650979 (0.17)
Amount	11.70956* (1.89)	1.963641 (0.36)	11.87687* (1.92)	1.027391 (0.19)
Ownership	224.2409*** (2.88)	60.75483 (0.75)	219.8931*** (2.82)	47.57562 (0.59)
Plaintiff	-45.45453* (-1.85)	28.90527 (1.12)	-44.0201* (-1.79)	31.99595 (1.24)
Lawindex	6.893669*** (2.66)	6.990369*** (2.81)	6.826981*** (2.63)	7.817517*** (3.16)
_cons	-495.2068 (-1.27)	258.855 (0.66)	-496.995 (-1.27)	407.5283 (1.04)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案件类型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926	882	926	882
R ²	0.2010	0.1950	0.1989	0.1942
F 值	5.04	4.72	4.97	4.70

在回归（三）中，解释变量为官员变更，被解释变量为诉讼周期。我们在每种官员变更的情况下，将

样本分为两组，分别为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并分别进行回归。当书记发生变更时，国有企业的平均诉讼时长与书记变更关系不显著；私人企业的平均诉讼时长与书记变更在 1%水平上成显著正相关。而且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书记变更会使平均诉讼时长增加 43 天；对于私人企业来说，书记变更会使平均诉讼时长增加 98 天。这说明由于书记变更对当地政治环境的重大改变，使得当地法院的审判效率下降。但是由于国企归属于国家，当地书记的变更对它的诉讼效率较小；而民营企业归属个人，当书记变更时企业主原有的政治关系发生改变，使得民营企业通过政治关系减少诉讼周期的可能性下降。

当省市市长发生变更时，国有企业的平均诉讼时长与省市市长变更关系不显著，民营企业的平均诉讼时长与省市市长变更在 1%水平上显著。而且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市长变更会使平均诉讼时长增加 16 天；对于私人企业来说，市长变更会使平均诉讼时长增加 92 天。这说明省市市长变更带来的政治环境的改变对国有企业的诉讼周期影响不大。而省市市长的变更仍会使民营企业原有的政治关系发生改变，使得民营企业通过政治关系减少诉讼周期的可能性下降。

五、 稳健性检验

前文已经证实，官员变更引起的政治不确定性会导致上市公司在当地法院审理的案件诉讼周期延长，而官员的异地调任进一步加剧政治不确定性程度，进而使诉讼周期进一步延长。不同产权性质的公司的诉讼案件受这种政治不确定性的影响不同。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其诉讼案件受这种政治不确定性的影响较小；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其诉讼案件受这种政治不确定性的影响较大。为了验证前文的结果稳健，我们对假设进行进一步检验。

（一）剔除省份数据

由于省级层面领导更替频率较低且多为异地任职，而省级法院审判案件的效率相对于地方法院较高。因此省级样本的存在可能会给研究结果带来偏误。考虑省级法院的数据可能会给我们的研究结论造成偏误，我们剔除了省级法院审判的案件样本，对地市级法院诉讼案件样本进行检验。

表 8 去除省级样本不同的官员变更类型和政治不确定性程度与上市公司法律诉讼周期的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一）官员变更				（二）政治不确定性	
	（1）书记变更	（2）市长变更	（3）任一变更	（4）双变更	书记异地调任	市长异地调任
Change	78.02634*** (3.91)	39.81316** (2.04)	75.91666*** (4.14)	129.8523*** (5.30)		
Yidi					102.9764*** (2.70)	62.75412* (1.86)
Size	5.152965 (0.59)	6.137062 (0.70)	5.225764 (0.60)	4.813766 (0.55)	4.276527 (0.24)	-14.60115 (-0.97)
ROE	-19.26026 (-1.41)	-20.40576 (-1.49)	-18.99139 (-1.39)	-19.77216 (-1.45)	-52.50103** (-2.14)	13.27082 (0.55)
Leverage	-19.59212** (-2.10)	-18.06509* (-1.93)	-17.96915* (-1.93)	-19.61669** (-2.11)	-20.71227 (-1.02)	-9.375968 (-0.46)
Amount	8.350177* (1.75)	8.553534* (1.79)	9.045096* (1.90)	6.836617 (1.44)	15.82764* (1.70)	13.62357* (1.74)
Ownership	135.6287** (2.10)	127.6216** (1.97)	126.0992* (1.95)	134.1782** (2.09)	155.036 (1.18)	-28.83154 (-0.27)
Plaintiff	0.0368243 (0.00)	0.8932835 (0.04)	-0.5646602 (-0.03)	1.803416 (0.09)	47.81294 (1.18)	25.19245 (0.73)
Lawindex	7.510793***	7.924122***	7.830447***	7.651996***	13.29905***	10.03619***

	(3.57)	(3.76)	(3.73)	(3.66)	(3.01)	(2.75)
_cons	793.2189*** (2.96)	790.7098*** (2.94)	755.495** (2.82)	849.97*** (3.19)	508.0293 (1.53)	1550.27*** (3.78)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案件类型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308	1308	1308	1308	395	439
R ²	0.1379	0.1303	0.1391	0.1464	0.2112	0.2374
F 值	4.70	4.40	4.75	5.04	2.24	2.93

表9 去除省级样本不同产权性质官员变更与上市公司法律诉讼周期的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三) 产权性质			
	书记变更		市长变更	
	国有企业	私人企业	国有企业	私人企业
Change	45.21415 (1.49)	115.7071*** (4.43)	14.60046 (0.49)	96.26608*** (3.73)
Size	-5.825851 (-0.46)	38.65273*** (2.94)	-4.820598 (-0.38)	40.38627*** (3.06)
ROE	-11.6777 (-0.39)	-8.553416 (-0.56)	-14.63675 (-0.51)	-11.93328 (-0.78)
Leverage	-20.45162 (-1.27)	3.904482 (0.32)	-19.93789 (-1.24)	7.167711 (0.59)
Amount	12.915* (1.75)	0.2162114 (0.04)	13.04118* (1.76)	0.0007304 (0.00)
Ownership	166.0378* (1.76)	64.06293 (0.71)	162.2309* (1.71)	32.62217 (0.36)
Plaintiff	-27.50746 (-0.94)	8.159848 (0.28)	-27.26756 (-0.93)	12.50862 (0.43)
Lawindex	8.290152*** (2.65)	7.410373*** (2.63)	8.353228*** (2.66)	8.307174*** (2.95)
_cons	173.6363 (0.48)	448.9398 (1.36)	145.9864 (0.41)	484.6268 (1.47)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案件类型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635	673	635	673
R ²	0.1784	0.2267	0.1755	0.2199
F 值	3.06	4.51	3.00	4.34

从以上各表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在剔除省级样本的回归中，不同官员变更类型与诉讼周期呈显著正相关，而且政治不确定性的增加会显著增加诉讼周期。对于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政治不确定性的影响程度不同，对于国有企业政治不确定性对其诉讼案件的诉讼周期影响较小，对于民营企业诉讼周期对其诉讼案件的诉讼周期影响较大。这些结论与前文的结论相一致，说明本文的实证结果是稳健的。

(二) 不同刻画诉讼效率手段

前文使用从案件起诉日期到判决日期的时间跨度所代表的诉讼周期来代表诉讼效率，这种方法较为简单。为了更有效地检验结果的合理性，我们取当年发生诉讼的周期的中位数为参照，用各个样本的诉讼周

期与改中位数作差，得到一个近似的超额诉讼周期，用超额诉讼周期来代表诉讼效率，进而进行 OLS 回归检验，验证结果的合理性。

表 10 不同刻画诉讼效率手段的官员变更类型和政治不确定性程度与上市公司法律诉讼周期的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一) 官员变更				(二) 政治不确定性	
	(1) 书记变更	(2) 市长变更	(3) 任一变更	(4) 双变更	书记异地调任	市长异地调任
Change	68.03311*** (3.79)	43.39948** (2.50)	74.07608*** (4.62)	110.8001*** (4.85)		
Yidi					91.18193*** (2.63)	89.69686*** (2.91)
Size	9.954513 (1.32)	10.5035 (1.39)	9.984552 (1.33)	13.38544 (1.74)	-8.205612 (-0.53)	-4.523768 (-0.33)
ROE	-14.28713 (-1.18)	-15.69721 (-1.30)	-14.03813 (-1.16)	-15.35252 (-1.27)	-42.7309* (-1.92)	10.77919 (0.46)
Leverage	-16.85191** (-2.19)	-15.64035** (-2.02)	-15.41081** (-2.00)	-16.87144** (-2.20)	-29.49415* (-1.69)	-8.526168 (-0.42)
Amount	8.290117** (2.02)	8.316702** (2.02)	8.502861** (2.08)	7.502303* (1.83)	12.10328 (1.39)	15.64568** (2.14)
Ownership	163.8216*** (2.95)	160.0939*** (2.87)	159.7642*** (2.88)	161.5532*** (2.91)	211.3129* (1.82)	-51.99465 (-0.51)
Plaintiff	-5.093145 (-0.29)	-3.88961 (-0.22)	-4.599994 (-0.26)	-3.672407 (-0.21)	31.24728 (0.87)	10.14612 (0.32)
Lawindex	6.477399*** (3.59)	6.7401*** (3.73)	6.80384*** (3.78)	6.664207*** (3.71)	11.87052*** (3.17)	9.107422*** (2.65)
_cons	775.7208* (1.66)	766.034 (1.64)	780.7777* (1.68)	781.0052* (1.68)	-4.246126 (-0.01)	-257.1981 (-0.64)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案件类型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808	1808	1808	1808	470	540
R ²	0.1223	0.1183	0.1257	0.1268	0.1457	0.2042
F 值	5.33	5.13	5.51	5.56	1.69	2.96

表 11 不同刻画诉讼效率手段的不同产权性质官员变更与上市公司法律诉讼周期的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三) 产权性质			
	书记变更		市长变更	
	国有企业	私人企业	国有企业	私人企业
Change	42.35322 (1.60)	97.44928*** (4.06)	15.82831 (0.62)	92.21309*** (3.95)
Size	4.963435 (0.47)	31.9948*** (2.72)	5.280438 (0.50)	32.5636*** (2.76)
ROE	-8.389008 (-0.37)	-10.77676 (-0.78)	-8.561434 (-0.37)	-13.82942 (-1.00)
Leverage	-19.94744 (-1.50)	-1.5962087 (-0.06)	-19.7244 (-1.48)	1.48779 (0.15)
Amount	11.66775* (1.88)	1.950999 (0.36)	11.83459* (1.90)	1.017665 (0.19)
Ownership	225.3851*** (2.89)	60.76677 (0.75)	221.1059*** (2.83)	47.62791 (0.59)

Plaintiff	-45.61337* (-1.85)	28.3267 (1.10)	-44.19598* (-1.79)	31.40758 (1.21)
Lawindex	6.877014*** (2.65)	6.977603*** (2.81)	6.812757*** (2.61)	7.802484*** (3.16)
_cons	-931.4081** (-2.38)	204.707 (0.46)	-932.9208*** (-2.38)	388.4236 (0.87)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案件类型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926	882	926	882
R ²	0.1976	0.1609	0.1956	0.1600
F 值	4.93	3.74	4.87	3.71

从以上各表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在使用超额诉讼周期代表诉讼效率的回归中，不同官员变更类型与诉讼周期呈显著正相关，官员的异地变更相对于本地升迁对于诉讼周期的影响更大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官员变更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对诉讼案件的诉讼周期影响较小；而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官员变更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对诉讼案件的诉讼周期影响较大。这些结论与前文的结论相一致，说明本文的实证结果是稳健的。

(三) 分案件类型讨论

表 12 不同案件类型的任一变更与上市公司法律诉讼周期的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任一变更		
	(1) 案件类型 1	(2) 案件类型 2	(3) 案件类型 3
Change	58.13183** (2.29)	52.56611* (1.76)	86.30408*** (3.11)
Size	33.346** (2.32)	-5.789142 (-0.41)	12.80027 (1.08)
ROE	-19.35189 (-1.30)	12.04802 (0.43)	-9.809369 (-0.42)
Leverage	0.7720905 (0.07)	-45.49989*** (-2.79)	-18.2052 (-1.13)
Amount	10.05705 (1.12)	18.39266** (2.53)	.3671138 (0.06)
Ownership	254.9575** (2.50)	229.8562** (2.32)	92.86489 (1.01)
Plaintiff	1.471148 (0.04)	-32.343 (-1.07)	-3.562042 (-0.12)
Lawindex	10.02584*** (3.13)	-.1619429 (-0.05)	9.812305*** (3.44)
_cons	152.1453 (0.55)	-125.8043 (-0.28)	215.4515 (0.52)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案件类型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587	464	757
R ²	0.2183	0.1664	0.757
F 值	3.62	2.05	3.45

由于不同案件类型的性质有所不同，它们受官员变更的影响也就有所不同。通过对不同类型的案件分别做回归，可以发现，官员变更对案件类型 1（银行与企业间的借贷案件）的诉讼周期的影响在 5%水平上显著。且诉讼周期受官员变更的影响较大，平均诉讼周期延长 58 天。官员变更对案件类型 2（日常业务合同纠纷）的诉讼周期的影响在 10%水平上显著，且诉讼周期受官员变更的影响最小，平均诉讼周期延长 53 天。官员变更对案件类型 3（其它诉讼）的诉讼周期的影响在 1%水平上显著。且诉讼周期受官员变更的影响最大，平均诉讼周期延长 86 天。对于借贷案件涉及的主体往往是钱，对于日常业务合同纠纷涉及的主体往往是物，而对于其它案件涉及的主体往往是人。在进行诉讼时，当事人一般最注重人，其次是钱，最后是物。因此，在涉及人的案件，诉讼参与方往往最可能使用自身的关系网络去影响法院的判决，诉讼官员变更对诉讼周期的影响最大也最显著；相反，货物对诉讼参与方来说往往可能最不重要，诉讼参与方使用自身的关系网络去影响法院的判决的可能性最小也最不显著。回归的结果与我们在前文的论证结果相一致。

六、 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上市公司在日常运营中不仅面临着运营风险、财务风险等公司自身的非系统风险，而且会面临着由于外部政治环境的改变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以往的文献主要集中于研究政治不确定性对公司经营决策和财务决策的影响，却较少关注由于政治不确定性带来的公司法律诉讼周期的影响。

因此，本文从官员变更这一切入点出发，探究由于官员变更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对上市公司法律诉讼周期的影响。本文以 1995-2013 年上市公司的诉讼案件为样本，以书记变更、市长变更、任一变更、双变更来刻画政治不确定性，以官员是否异地调任来刻画政治不确定性程度，以案件从起诉日期到审判日期的时间跨度来衡量诉讼周期，探究政治不确定性对上市公司诉讼案件诉讼周期的影响。研究表明，官员变更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会使当地的法律诉讼周期延长，而且当官员为异地调任时对当地法律诉讼周期的影响会进一步加大。而且，通过分组检验我们发现，官员变更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对民营企业诉讼周期的影响程度比国有企业更大。

总的来说，本文将官员变更带来的政治不确定与上市公司诉讼案件的诉讼周期联系在一起。由于官员变更带来政治不确定性的发生导致当地法院会付出大量精力去适应这样的政治环境改变，了解新任地方政府的执政政策，降低了法院的审判效率，延长了案件诉讼周期。进而，这导致了上市公司在诉讼案件上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大大增加，增大了上市公司的时间成本，降低了他们的经营效率。本文给予我们两大启示，一方面我国要继续坚持“依法治国”道路，增强司法的独立性，减轻当地政府对司法效率和司法独立性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反腐浪潮之际，多地主政官员落马，官员变更频率和官员异地变更频率大幅增加。这虽然有助于查除当地原有的官商勾结和贪污现象。但是，在执政初期，新任政府在扫除原政府存在的顽疾之时，尽量维持当地政治环境和司法环境的稳定，减轻由于政治不确定性对诉讼周期的影响，减少诉讼周期延长给上市公司带来的时间成本，提高上市公司的经营效率。

参考文献

- [1]陈卫东、王政君：《刑事诉讼中的司法资源配置》，《中国法学》，2000 年第 2 期。
- [2]陈艳艳、罗党论：《地方官员更替与企业投资》，《经济研究》，2012 年第 2 期。
- [3]曹春方：《政治权力转移与公司投资：中国的逻辑》，《管理世界》，2013 年第 1 期。
- [4]勾自强：《浅析影响我国刑事诉讼审判效率的因素——以经济分析方法为视角》，《时代贸易》，2008 年 S1 期。
- [5]胡旭阳：《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与民营企业的融资便利——以浙江省民营百强企业为例》，《管理世

界》，2006年第5期。

[6]李文贵、余明桂：《所有权性质，市场化进程与企业风险承担》，《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12期。

[7]罗党论、王珏：《政治不确定性与企业风险——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会议论文，2014年。

[8]罗党论、余国满：《地方官员变更与地方债发行》，《经济研究》，2015年第6期。

[9]宋乐、张然：《国有控股、法律诉讼与高管变更》，《会计之友》，2011年第18期。

[10]王福华、融天明：《民事诉讼发回重审制度之检讨》，《法学研究》，2007年第1期。

[11]王贤彬、徐现祥：《地方官员来源，去向，任期与经济增长》，《管理世界》，2008年第3期。

[12]王彦超、林斌、辛清泉：《市场环境、民事诉讼与盈余管理》，《中国会计评论》，2008年第1期。

[13]许年行、江轩宇、伊志宏、袁清波：《政治关联影响投资者法律保护的执法效率吗？》，《经济学（季刊）》，2013年第2期。

[14]徐现祥、王贤彬、舒元：《地方官员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长、省委书记交流的证据》，《经济研究》，2007年第9期。

[15]徐业坤、钱先航、李维安：《政治不确定性，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投资——来自市委书记更替的证据》，《管理世界》，2013年第5期。

[16]姚莉：《司法效率：理论分析与制度构建》，《商法研究》，2006年第3期

[17]余明桂、回雅甫、潘红波：《政治联系、寻租与地方政府财政补贴有效性》，《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

[18]余明桂、李文贵、潘红波：《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风险承担》，《金融研究》，2013年第1期。

[19]余明桂、潘洪波：《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银行贷款》，《管理世界》，2008年第8期。

[20]张军、高远：《官员任期，异地交流与经济增长——来自省级经验的证据》，《经济研究》，2007年第11期。

[21]张敏、黄继承：《政治关联，多元化与企业风险——来自我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2009年第7期。

[22]张志强：《考虑全部风险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管理世界》，2010年第4期。

[23]Alberto Alesina and Roberto Perotti,1996,"Income distribution,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investment",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40 (6), pp.1203-1228.

[24]Amoah N. Y. and A. P. Tang,2010, "Board, audit committee and restatement-induced class action lawsuits", *Advances in Accounting*, Vol.26(2),pp.155 — 169.

[25]Bemanke, B. S., 1983, "Irreversibility, Uncertainty and Cyclical Invest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98(1), pp. 85-106.

[26]Bhagat S., J. A. Brickley and J. L. Coles,1994, "The costs of inefficient bargaining and financial distress: Evidence from corporate lawsuit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35, pp.221—247.

[27]Bloom, N., S. Bond and J. van Reenen, 2007, "Uncertainty and Investment Dynamic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74(2), pp. 391-415.

[28]Chen S.M., Sun Z., Tang S. and Wu D. H., 2009,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Investment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SO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in China", Working paper of CFRN.

[29]Clarke, D., P.Murrel, and S. Whiting, 2006, "The Role of Law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30]Cohen, L., J. Coval and C. Malloy, 2011, "Do Powerful Politicians Cause Corporate Downsiz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19(6), pp. 1015~1060.

[31] David J. Denis, P. Hanouna and A. Sarin, 2006, "Is there a dark side to incentive compensation?",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Vol.12(3), pp.467—488.

[32]Francis J., D. Philbrick and K. Schipper, 1994, “Shareholder litigation and corporate disclosure”,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Vol.32, pp.137-164.

[33]Gong. G., H. Louis and A. X. Sun, 2008, Earnings management, lawsuits, and stock-for-stock acquirers’ market performance,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Vol.46(1), pp62—77.

[34]Haley, J., 1978, “The myth of the reluctant litigant”,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Vol.4, pp.359—390.

[35]La Porta, R., F. Lopez-de-Silanes A. Shleifer and R. W. Vishny, 1997, “Legal determinants of external finance”, *Journal of Finance*, Vol.52, pp.1131—1150.

[36]La Porta, R., F. Lopez-de-Silanes A. Shleifer and R. W. Vishny, 1998, “Law and fina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06, pp.1113—1155.

[37]La Porta, R., F. Lopez-de-Silages A. Shleifer and R. W. Vishny, 1999, “Corporate ownership around the world”, *Journal of Finance*, Vol.54, pp.471—517.

[38]La Porta, R., F. Lopez-de-Silages A. Shleifer and R. W. Vishny, 2000, “Investor protec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58, pp.3—27.

[39]Li H. B., Meng L. S., Wang Q. and Zhou I., 2009, “Political Connections, Financing and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ese Private Firms” ,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87(2), pp.283-299.

[40]Lu H. T., Pan H. B., Zhang C. Y., 2014, “Political Connectedness and Court Outcomes: Evidence from Chinese Corporate Lawsuit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rd Review.

[41]Julio, B. and Y. Yook, 2012, “Political Uncertainty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Cycles”, *Journal of Finance*, Vol.67(1), pp.45-83.

[42]John W. Goodell, Sami Vähämaa, 2013,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nd implied volatility: The role of political uncertainty”,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Vol. 37(3), pp. 1108-1117.

[43]Mauro, Paolo, 1995, “Corruption and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0, pp.681-712.

[44]Mc Tier, B. C. and J. K. Wald, 2011,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securities class action litigation,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Vol.17 (3), pp.649-665.

[45]Peng, L. and A. R dell, 2008, Executive pay and shareholder litigation, “*Review of Finance*”, Vol.12(1), pp.141—184.

[46]Ramseyer, J. M., 1988, “Reluctant litigant revisited: Rationality and disputes in Japan”,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Vol.14, pp.111—123.

[47]Ramseyer, J. M. and M. Nakazato, 1989, “The rational litigant: Settlement amounts and verdict rates in Japan”,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18, pp.263—290.

[48]Skinner, D. J., 1994, “Why firms voluntarily disclose bad new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Vol.32, pp 38—60.

[49]Skinner, D. J., 1997, ”Earnings disclosures and stockholder lawsuit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Vol.23, pp249—282.

[50]Yonne, A. T., 2010, “Uncertain Growth Cycles, Corporate Investment and Dynamic Hedging”, Dissertation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Political Uncertainty and Litigation Efficiency—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Firms

Abstract: Local officials have powerful influence 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of the area under their jurisdiction. According to research, the political uncertainty aroused by official turnovers often has a major impact on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of corporates and even economy growth.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investigate the problem: What influence does political uncertainty have on local legal environment? More precisely: (1) Does the political uncertainty aroused by official turnovers influence litigation efficiency of corporates? (2) Which factors can aggravate or mitigate this mechanism? Using data of listed firms in China from 1995-2013 as sample, we find the political uncertainty significantly decreases the litigation efficiency of corporates, and has more powerful impact to private corporates. In addition, the more volatile the political uncertainty is, the more powerful the impact is on the litigation efficiency.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help us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n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power on judicial power and help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political uncertainty and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it causes as well.

Key word: Official turnovers; Political uncertainty; Litigation cycle